



No. C1999015

1999-7

中国当前经济启动与未来增长潜力实现的途径

林毅夫

NO. C1999015 出版日期: 1999年7月

中国当前经济启动与未来增长潜力实现的途径

林毅夫

一、中国经济面临巨大挑战

这一、二年来，为了重新启动经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从 1996 年 5 月算起，已七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放松信贷控制，甚至大幅调低实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财政政策上则实行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并于去年增发 1000 亿元基本建设国债。但是实际效果不佳，经济启动乏力，形势十分严峻。

过去我国经济一向是“一放就活”，这次政府使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经济增长却依然启动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 20 年来，我国经济已出现了两个结构性变化。首先，我国的经济已经告别了短缺；其次，银行贷款的责任硬化。

在过去长期的短缺经济之下，企业总认为只要投了资，把产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获利。而且，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必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因此，一旦政府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投资的积极性，经济马上就会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货币政策的作用特别明显。但是，从 1993 年 7 月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银行体制改革已有了很大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大专业银行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地方政府对银行事务的干预大大削弱，各大专业银行和其它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银行内部实行了贷款风险责任制度，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因此，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同时，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突然从“六五”期间的年均增长 19.4% 和“七五”期间的年均增长

16.5%，跃升为“八五”期间的年均增长 36.9%，这些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大大地增加了我国各类产品的供应能力。而在“八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才分别为 7.7%和 4.3%，消费能力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1994 年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强，减员增效已经被确定为改革方针，政府机构也要大裁员，一些家庭的未来收入预期下降，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加。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也都是减少、取消公费福利，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大大增加。为了应付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满足预期会大幅增加的消费支出，维持未来生活水平不下降，普通居民家庭只有减少当前的开支，增加现期储蓄。因此，等“八五”期间的投资项目陆续在 96、97 年建成投产时，我国不仅告别了几十年来的短缺，而且，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形。现在，许多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幅度超过 30%。

在过剩经济下，企业不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在借钱要还的前提下，即使利率再低，也不敢轻易借贷，投资需求必然不旺；而且，银行也自然会出现惜贷的现象，以前非常有效的货币政策当然不再奏效。同时，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开工不足，对劳动力的使用有限，职工收入下降，而且，企业破产、职工失业的可能性增加，消费需求增长也将萎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约占整个经济总需求的 85%，这两方面需求增长的下降和萎缩，反过来又强化了生产能力过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疲软的状况，形成了难于走出的恶性循环。日本在 1991 年泡沫经济破裂以后，消费萎缩，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的情形，日本政府使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各种手段，至今已近 9 年，不仅未能走出上述恶性循环的泥沼，而且，每况愈下。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是在 1929 年美国纽约股市崩盘后，国民财富萎缩，消费急剧下降，出现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而引起。直到 1944 年，美国参加二战，全面军事动员，才使美国最终走出生产能力过剩所导致的恶性循环的漩涡。到底中国能否顺利走出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消费不足、市场疲软的困境，并继续在较长的时期里维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许多人甚至担心中国经济将从此丧失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增长的能力，不断为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所困扰。

二、新农村运动与当前经济的启动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市场极度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新形势下，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增长十分重要，是目前国民经济能够走出困境的关键。

总需求包括民间消费需求、民间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和政府需求四大块。从理论上说增加出口需求和政府需求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但 1998 年出口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9.2%，出口中有一半靠进口原材料，因此，即使采用各种手段能使我国的出口增长 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 1%。更何况，中国的周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的不利影响很大，要增加出口有很大的难度。因此，要增加有效需求，似乎仅余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一途，也就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政府更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支出弥补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不足是难以凑效的。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相对重要性逐渐下降，财政总收入在 1998 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4%。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1992 年以来国家投资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 5% 以下，1998 年虽然加大了财政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国家投资比重也只达 3.4%。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作用有限。事实上，美国的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虽然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但在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上作用有限，对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时生产能力过剩的恶性循环，并无多大助益。

从日本经济在 1991 年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形成消费不足、生产能力过剩至今未能走出困境，以及美国经济在 1929 年出现危机，直到 1944 年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军事动员才走出生产能力过剩的恶性循环的经验来看，象我国当前全社会的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普遍出现 30% 甚至更多的过剩时，一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刺激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都会失去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作用。我国的经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当前的困境，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存在有因为结构

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大的社会需求的存在，以及我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给这种蓄势待发的需求创造实现需求的条件。否则，我国的经济只能靠各个产业淘汰大批效率较低的企业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将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目前的中国与 30 年代大危机中的美国和 90 年代以来的日本相比，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农村市场，而且市场的潜力很大，远未饱和。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最为严重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 1998 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 32.6、9.3、22.8 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 30.1%、12.2%、25.2%（见附表）。

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前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对我国市场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农村有 2.3 亿户，比城镇 1.1 亿户多出 1 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三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 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 1300 台。因此，一旦这些产品开拓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就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极强的乘数效应，成功启动当前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早在 80 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大市场的努力已经有好几年了，效果却十分不佳。然而，其原因不在农民的收入太低，1998 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2162 元，比 1991 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2025 元略高。1991 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 68.4 台，电冰箱 48.7 台，洗衣机 80.6 台，分别比 1998 年农村居民的拥有量高出 1.1 倍、4.2 倍和 2.5 倍。而在 1998 年彩电、冰箱、洗衣机价格要比供应还比较紧俏的 1991 年价格低许多。诚然，农民的收入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具有不可比性，农民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化肥、种子，上缴各种税、费、提留，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低，但在 1997 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存收入为 3,457 元，比 1991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出 71%，即使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广东农村居民在 1997 年实际可用来消费的收入也一定比 1991 年的城镇居民高，但广东农村居民在 1997 年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也远低于 1991 年时城镇居民的拥有量（见附表）。由此可见，收入不是限制农村消费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低是由于消费习惯造成的，比如，农民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建房而挤压了其他消费。然而，这个说法站不

住脚，因为，同为家电产品的收录机，1998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为32.6台，与城镇居民1991年时的34.7台相差无几。1997年广东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量达50.3台，比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拥有量高出54.3%，高出的水平和其较高的收入水平相当。

为何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需求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收录机的消费不需要其他基础设施与其配套，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则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才可。但目前农村电网老旧，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5倍、甚至10倍；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如果，改善农村电网，把农村电价降低到城镇的同等水平，发射一颗可以把电视信号覆盖全国农村的电视转播卫星，在各个自然村修建自来水水塔，提供农民生活用水。可预见的，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走出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所导致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物价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我国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可以对启动经济很快发生作用。如农村自来水供应系统，全国有行政村74万个，有一半没有自来水供应，假设在37万个村，每个村建一个水塔和相应的管道设施，投资10万元，全国总计只需要370亿元。如果政府提供一半的财政补贴，农民自己提供一半的配套资金，则政府的财政支出只要185亿。一旦自来水供应问题得到解决，除了，将会刺激对洗衣机、电冰箱的需求外，很快就会掀起农民自发的厨房革命，厕所革命等和生活质量有关的建设高潮，进一步刺激内需。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的萧条陷阱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真正的启动市场。以新农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除了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释放出来，而且，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还具有如下好处。农村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这些项目，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从 1979 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 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

三. 中国经济未来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虽然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启动乏力，但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不利变化，在未来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继续维持 8—10%的年均增长率。

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 1—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附加值的部门转向高附加值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因此而增加。在同样的投入要素和同样的产业结构的条件下，技术升级了经济也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不会下降，从而资本积

累率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技术进步，只有不断引进新技术才会有新产业的不断涌现。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它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不会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开发研究成功，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许多研究证明，即使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该项技术研究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如果将其它 95%左右的科研项目失败的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那么引进技术的实际成本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尚不及全部研究开发成本的 1%。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所以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经济技术总体的进步慢；而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

日本经济从 5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 60 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转型与增长。

中国经济在 1978 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以引进技术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在 1978 年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远大于日本于 50 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 60 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近 40 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有 50 年左右快速增长的潜力。而且，即使到了 90 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 50 年代的日本和 60 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积累率每年高达 GDP 的 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

素表明，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维持 50 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从 1978 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 20 年，因此，中国有潜力再维持 30 年的快速增长。

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是美国。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5 年中国的人均 GNP 为 620 美元，美国为 26,980 美元，人均只有美国的 43 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规模为美国的 4.6 倍，所以，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在 1995 年时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1995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 2,920 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二分之一。在过去这 20 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年均只有 3% 左右。由于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边际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 3% 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而中国经济有再维持 30 年左右的 8~10% 快速增长的潜力。因此，在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

四、中长期市场需求的热点和启动策略

从生产和技术的潜力来看，我国完全有可能再维持 30 年左右的快速增长，但这种潜力能否发挥出来，还取决于我国能否在需求上不断找到新的消费热点，使生产潜力能够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就当前而言，我国可以通过新农村运动消化现有的过剩生产能力。就中场期来说，汽车和居民住房有可能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消费热点。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Robert Fogel, 1999）最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大约为美国 1897 年时的水平。1910 年至 1970 年汽车作为新型交通工具在美国迅速普及，汽车需求的收入弹性为 2.6。即人均收入增长 1%，汽车的需求就会增长 2.6%。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 6%，而且收入弹性与美国相似，到 2015 年，中国的家庭和企业每年将购买 1000 万辆汽车，这是目前美国的汽车购置水平。中国汽车现在的年产量约为 160 万辆。因此，15 年后，为满足上述需求，产量需增长 6 倍。即使假设中国汽车需求的收入弹性比美国少三分之一，每年购买 1000 万辆汽车的转折点也

只是稍加延后到 2022 而已。同样，住房也具有高收入弹性的特性。住房需求的增长将远大于收入增长。

把汽车和住房做为我国新的消费热点的观点已有不少人提出，我国政府也已把此两者做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项目，但是效果十分不理想。目前，汽车并未能进入一般家庭，住房商品化也难于实行。其原因在于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以高档汽车为主，在高关税的保护下，一般的价格在 20 万元人民币或更高的水平，除了公家外，绝大多数的家庭买不起，而即使有少数家庭买得起车也负担不起每年要缴交的各种高昂的税费。汽车进不了家庭，汽车的产量就不可能太大，于是，汽车产业达不到规模经济，成本也就降不下来，无法和国外生产的汽车竞争，反过来，汽车产业的生存就只能靠政府保护，在保护下，生产汽车的企业改进生产的积极性低，质量提不上去，价格低不下来，汽车也就永远难于进入普通家庭。

汽车进不了家庭，住房就只能挤在城市里。而城市里土地供给有限，土地开发、城建费用、地价等都高，在城里盖高层塔楼的造价也高，房地产的价格也就相应的贵，工薪阶层承受不起，住房也就无法真正的商品化。

如果汽车能够进入家庭，郊区地多，环境比内城好，开发成本又低，住房就会往郊区发展，房地产也就有可能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且，购物中心和其他商业、生活、文化消遣设施也会往郊区转移。目前，城里所以交通拥挤，原因就在于除了办公外，各种商业、文化、生活活动过度集中在城里。所以，象发达国家一样，当小轿车进入家庭以后，城里的交通状况反而会好转。

就开发我国未来中长期的消费热点来说，突破口在于大力发展我国一般家庭购买得起，价格在 3 万到 5 万元人民币，即 5000 美元左右的家庭用轿车，而非，当前发展的高档小轿车。

如果，我国以发展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小轿车为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并且取消各种不合理的税费，那么，很有可能如福格尔预测的那样，到 2015 年我国每年汽车的需求量将达 1000 万辆的水平。汽车就将象 1980 年代的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一样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热点。而且，我国可以发展出 10 家左右年产量达 100 万量的汽车企业，足以达到规模经济，并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美国、日本、欧洲等高收入国家已不具备生产

这种低价位小轿车的比较优势，我国的汽车产业也将象现在的家电产业一样，不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完全可以和国外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竞争，我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低价位小轿车的主要生产和输出国。

五、结束语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这种困难是暂时的，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因素仍然没有变化。从生产和技术来说，我国经济有再取得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快速增长的潜力。在告别了短缺以后，未来限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将会是需求。目前，急需克服的是各个产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问题。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巨大。针对目前形势，我国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发动一场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电气化和自来水化，为农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而消化现有的过剩生产能力。从中长期着眼，应该以一般家庭能够消费得起的汽车产业为突破口，来带动房地产业的发展，将汽车和房地产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下个世纪中叶之前，实现民族的复兴，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

参考文献

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林毅夫、蔡方、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C1999006。

林毅夫：《深化市场改革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0 期。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No.C1999019。

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和人均纯收入

	1998年城镇居民	1998年农村居民	1991年城镇居民	1997年广东农村居民
彩电	105.4	32.6	68.4	46.1
电冰箱	76.1	9.3	48.7	9.9
洗衣机	90.6	22.8	80.6	18.9
收录机	57.6	32.6	34.7	50.3
人均纯收入	5,425	2,162	2,025	3,467